

# 日本圣尼古拉

*Bishop Alexander (Mileant)*

## 目录:

---

|          |   |
|----------|---|
| 生平 ..... | 2 |
| 使命 ..... | 4 |
| 函馆 ..... | 6 |

|                           |    |
|---------------------------|----|
| 初见成效 .....                | 8  |
| 来自俄罗斯的援助 .....            | 12 |
| 《圣经》及其他必要书籍的翻译 .....      | 13 |
| 战争 .....                  | 18 |
| 生命的最后几年与离世 .....          | 20 |
| 圣尼古拉大教堂 .....             | 23 |
| 尼古拉·雅波斯基的箴言与教诲 .....      | 25 |
| 为试炼预备你的灵魂 .....           | 25 |
| 致马卡里 ( 涅夫斯基 ) 大主教的信 ..... | 28 |
| 结语 .....                  | 32 |

---

## 生平

等同于使徒的尼古拉（卡萨特金），作为日本教会的创立者和首任主教，是20世纪杰出的俄罗斯传教士。他于1912年安息主怀，在逝世六十周年之际（1970年3月31日）被册封为圣人。

这位无私的传教士将毕生心血和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在“旭日之国”宣讲福音、播撒上帝圣言的事业，他那堪比使徒的功绩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长名和光写道：“他为后世留下了1座主教座堂、8座圣堂、175座教堂、276个教区，培养出1位主教、34位神父、8位执事和115位传道者。东正教信徒总数达到34110人……”

曾访问日本的首席神父伊·沃斯托尔戈夫写道：“在日本，除了天皇之外，没有谁能像他那样享誉全国。在日本首都，根本无需询问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的所在地，只需说出‘尼古拉’这个名字，几乎每一位人力车夫都会立刻知道该把传教团的客人送往何处。东正教堂名为‘尼古拉’，传教团所在地也叫‘尼古拉’，甚至东正教本身也被称为‘尼古拉’。”当我们身着俄罗斯神父的服饰游历这个国家时，无论何时何地，总会遇到亲切的目光；而在人们向我们问候和交谈的话语中，我们总能在那些陌生语言中难以理解的词语和表达里，听出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名字：“尼古拉”……

1著名东方学家D. M. 波兹涅耶夫曾与这位圣徒私交甚笃，他回忆道：“他既温和，又如钢铁般坚韧，从不畏惧任何障碍；他头脑务实，是一位能干的行政管理者，总能从任何困境中找到出路。在和蔼可亲的同时，他也能对那些他认为需要通过严厉措施来管教、因某些事予以惩戒或制止的人，表现得冷若冰霜、毫不妥协且言辞犀利。在平易近人的同时，他却拥有经由长期经验和艰辛磨难所磨砺出的极度克制，要赢得他的信任与坦诚，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这个风趣的交谈者身上，既带着某种孩童般的天真，又兼具伟大政治家所特有的宏大理想，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祖国的苦难同苦，与祖国的煎熬同煎……崇高而神圣的理想、钢铁般的意志和永不枯竭的勤勉——这就是尼古拉大主教的本质。”

我们不得不赞同圣徒传记作者之一A·普拉托诺娃的观点，她曾写道：“尽可能详细地了解他，是每个俄罗斯人的责任，因为像尼古拉大主教这样的人，是祖国的骄傲与荣耀。”

他的活动伴随着许多苦难。 尼古拉大主教遭到两方面的迫害：日本人视他为俄罗斯的政治代理人、间谍和煽动者，指责他在日本境内散播叛国思想，煽动民众对背信弃义、掠夺成性的俄罗斯产生同情；而俄罗斯人则指责他向日本透露了本不该让日本知晓的俄罗斯内情…… 因此，大主教的活动不仅被宣称毫无用处，甚至被视为有害；而在俄罗斯国内，许多人则将他视为一个被奇怪妄想所困扰的怪人。大主教尼古拉之所以能坚持事业，得益于他一生中始终秉持的两个理念：其一，是使徒事工的理念，即在异教徒中传播东正教的壮举； 第二——他坚信自己的工作必须与政治完全脱钩。”而在另一处则写道：“他内心深处深知，自己所坚守的并非为了世俗的目的。”

## 使命

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卡萨特金于1836年8月1日出生于斯摩棱斯克省维尔斯基区贝雷扎村<sup>1</sup>。他的父亲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卡萨特金在乡村教堂担任执事<sup>2</sup>。 孩子被取名为约翰，以纪念那位荣耀的先知、主的施洗者约翰。他的母亲克塞尼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在他仅五岁时便因病去世，享年34岁。

尽管家境极其贫困，这个男孩还是先被送往韦尔斯科神学院学习，随后又进入斯摩棱斯克神学院深造。S·涅达钦写道：“由于当时没有铁路，这位少年不得不跋涉穿过韦尔斯科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贫民窟——这些贫民窟至今依然存在——前往省会城市斯摩棱斯克，以便在神学院接受教育。 当时并非所有神学院学生都骑马上学。其中许多人——尤其是最贫困的那些，卡萨特金少年便属于这一类——不得不徒步跋涉超过150俄里，才能抵达神学院。”

1856年，他以优异成绩从神学院毕业，并由政府资助进入圣彼得堡神学院深造，在那里学习直至1860年。

莫斯科尼基廷斯卡娅街“主升天教堂”的教友们查证，该村原址现为特维尔州奥列宁斯基区莫斯托夫斯基乡村区下的别列扎村。1836年，贝雷扎村是韦尔斯基区贝雷佐夫斯基乡的中心，共有5户人家（7名男性和6名女性）。如今，该村已没有一栋房屋留存。乡村教堂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被摧毁。

这位圣徒一直照顾着他的父亲，直到父亲去世，每月都会将部分薪水分给他。

这位年轻人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原本预计他会留在学院为日后担任教授做准备，然而决定前往日本的决定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这一决定完全出乎意料。据圣尼古拉本人所述，在此之前，他从未想过要出家。然而有一天，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在穿过学院走廊时，注意到其中一间“休息室”里张贴着一则公告，邀请学院课程的毕业生中有人前往日本，担任函馆使馆教堂的主任牧师。卡萨特金的一些同学已经表示愿意以神父的身份前往日本。尽管戈洛夫宁关于日本的回忆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这份邀请并未给这位年轻人带来特别的触动。他若无其事地前往参加彻夜祈祷。就在礼拜进行期间，他突然下定决心，自己必须去日本。从彻夜祈祷礼回来后，他满怀激动地前往神学院院长——内克塔里乌斯主教处，向他表明了自己想去日本的意愿，但不是以未婚神父的身份，而是以修士的身份。神学院院长对这位青年的热忱深表同情，并将他的意愿禀报给了都主教。转眼之间，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卡萨特金的前途便已尘埃落定。

1860年6月21日，这位青年受戒成为修士，法名尼古拉。6月29日，即圣首席使徒彼得与保罗节当天，他被按立为司祭执事；次日，在庆祝“十二使徒大公会议”（即学院教堂的主保圣日）时，他又被

按立为司祭修士。 为这位青年剃度受戒的涅克塔里主教，为他取名尼古拉，并说道：“你不必在修道院中度过苦修生活。 你必须离开故土，前往遥远且异教的国度侍奉主。除了苦行者的十字架，你还必须扛起朝圣者的手杖；除了修道生涯的修行，你还将肩负使徒般的使命。”

六月底，尼古拉神父离开了圣彼得堡，在乡下与亲人共度了三天。与亲人告别后，他踏上了遥远的旅程。他随身携带了斯摩棱斯克圣母像，并终生珍藏着它<sup>4</sup>。

前往日本的旅程漫长而艰辛。尼古拉神父在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度过了那个冬天。在那里，他见到了西伯利亚的传教士圣因诺肯提（当时担任堪察加主教）。 后者为他即将开展的事工给予了祝福，并建议他全力投入日语学习。看到这位修士破旧的修道袍，因诺肯提主教买来上好的天鹅绒，亲自为尼古拉神父裁剪了一件新修道袍。 此外，他还为尼古拉神父佩戴了一枚因参加克里米亚战役而获得的胸前青铜十字架。

1861年6月14日（2日），修道士尼古拉乘坐军用运输船“阿穆尔号”抵达日本函馆港。

## 函馆

约瑟夫·安东诺维奇·戈什凯维奇（1814-1875）被任命为驻函馆的首任俄罗斯领事，他是一位在许多方面都极为杰出的人物<sup>5</sup>。 1858年9月第三个十日，他携家人、一名海军军官、一名医生、一名神职人员（后者因病于领事馆成立当年返回祖国）、四名男仆和两名女仆抵达函馆。

早在修道士尼古拉抵达日本之前，俄罗斯领事馆就已经在函馆建成了基督复活教堂（后来，在函馆大火期间，这座教堂被烧毁，原址上建起了一座石造教堂）。 该教堂由瓦西里·马霍夫神父负责建造

并主持祝圣。一年后，因病他不得不离开日本返回祖国，此后，伊·阿·戈什凯维奇便向圣 synod 提出请求，希望派遣一位拥有最高神学教育水平的牧师前来。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日本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极为敌视。西方国家强加的“和平”条约引起了武士们的极度不满，他们将外国人视为“野蛮人”，并主张将其彻底驱逐。因此，国家开放和外国人的出现助长了极端排外情绪，这种情绪有时甚至表现为公开的暴力行为。例如，仅在1861年上半年，就有六名外国人被杀害。针对基督徒的武装袭击在京都、江户和横滨频发，日本人几乎将基督徒视为头号敌人。虽然函馆未发生此类事件，但日本人对俄罗斯人的态度，其怀疑程度丝毫不亚于对其他外国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动荡加剧，随之而来的反幕府情绪也日益高涨。1862年，一场真正的内战爆发，直至1868年幕将军辞职、帝国政府成立才告结束。命运的安排下，被斋藤舰队占领的函馆成为了幕府势力的最后据点。然而，这支舰队早在1869年5月就被帝国军队击溃。天皇迁都至江户，此后该地被命名为东京，即“东都”。明治时代——“开明统治”的时代——由此拉开序幕。

“唯有主知道，在这最初的几年里，我经历了多少苦难。那三个敌人——世界、肉体和魔鬼——都以全部力量向我发起进攻，紧追不舍，企图在第一个幽暗狭窄之处将我击倒，而这些诱惑表面上看起来是再正当不过的：“难道我，和所有人一样，不是为了家庭生活而被造的吗？难道不能在世俗中光辉地侍奉上帝和邻人吗？最后，如今俄罗斯难道不比日本更需要人才吗？”诸如此类。成千上万的蛊惑之词不断灌入你的耳中，日复一日，时时刻刻，无论在清醒时还是在梦中，无论是在家中的静室，还是在教堂里祈祷时。要战胜这一切，需要极大的精神力量，以及极其深厚的宗教情怀。”

至于布道，根本无从谈起，因为“当时的日本人把外国人视为野兽，把基督教视为邪教，认为只有十恶不赦的恶棍和巫师才会加入其中。”此外，这位年轻的传教士既不懂日语，也不了解日本的宗教

、历史和文化。“抵达日本后，我竭尽全力开始学习当地语言。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才终于弄懂了这种野蛮的语言——它无疑是世上最难学的语言，因为它由两种语言构成：天然的日语和汉语，二者相互交织，却丝毫没有融合为一。 <...>我总算勉强学会了说日语，并掌握了那种用于原创及翻译学术著作的最简单、最轻松的书写方式。”起初，教他日语的是函馆知事的翻译。在后者的推荐下，尼古拉修士开始就读于以学识渊博著称的木村健哉开设的私塾。在那里，他还研习了日本的历史与文学，以及佛教、神道教和儒家思想。除木村贤哉外，他的导师还有佐贺玄和新岛四郎。这些书斋研习耗时八年。在这段时期，他几乎每天都要学习14个小时。与此同时，他还开始参加文学聚会并参拜神道教神社。D. M. 波兹涅耶夫<sup>6</sup>写道：“通过持续阅读日本文学作品并不断与日本人交流，尼古拉神父对日语的口语和书面语达到了惊人的掌握程度。虽然他带有浓重的外来口音，但这并不妨碍所有日本民众——无论老少——都能听懂他所说的话；他丰富的词汇量和流畅的句式构架赋予了他的言谈一种力量，令所有日本人都为之倾倒……他的语句简洁，措辞出人意料，却极其生动有力。”

“起初，我竭力细致地研究日本的历史、宗教以及日本民族的精神，以了解通过福音布道来启迪这个国家的希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而我对这个国家了解得越多，就越确信，福音之声将响彻云霄、迅速传遍帝国各个角落的那一天已经近在咫尺。”

## 初见成效

首位皈依东正教的日本人是**泽边拓马**（1835-1913），他曾是土佐藩的武士，也是函馆一座古老神道教神社的祭司。泽边曾是某秘密社团的成员，该社团以将所有外国人驱逐出日本为目标，他本人也以出色的剑术高手而闻名。正是作为剑术老师，他曾前往俄国领事伊·阿·戈什凯维奇的儿子家中授课

。他曾游历日本各地，靠教授剑术谋生。来到函馆后，他娶了一位神道神社神官的女儿为妻，不仅继承了对方的姓氏“泽边”，还继承了岳父世袭的神官身份及其供职的神社。

“佐贺部在异教环境中过着安宁无忧的生活。作为城里最古老神社的祭司，他深受民众尊敬，收入丰厚，只知知足与幸福。他的家庭中有位美丽的年轻妻子、一个年幼的儿子和岳母。他以自己的祖国和祖先的信仰为荣，因此鄙视外国人，憎恨他们的信仰——而他对这种信仰的理解却毫无根据。”

关于这位严厉的日本人于1864年皈依的详细叙述，见于A.普拉托诺娃的著作中。

佐贺部在领事官邸里时常与修道士尼古拉碰面，每次都用充满仇恨的目光盯着他，以至于有一次尼古拉再也忍无可忍，问道：

“你为什么这么生我的气？”随即得到了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

“你们这些外国人，都该被杀光。你们是来觊觎我们国土的。而你，靠着你的布道，只会给日本带来更大的危害。”

“难道你已经了解我的教义了吗？”

“不，”日本人有些尴尬地回答。

“在不听对方解释的情况下就妄加评判，更不用说谴责，这公平吗？诋毁自己不了解的事物，这公平吗？你先听一听，了解清楚，然后再做判断。如果我的教义有问题，那时再把我们赶走。那样你才算公正。”

“好吧，说吧！”

尼古拉神父的话让这位武士深受震撼。他请求允许再次与神父会面，继续交谈。不久之后，尼古拉神父便给伊西多尔都主教写信道：“有一位古老宗教的祭司常来找我，学习我们的信仰。如果他不会冷淡下来，也不会因皈依基督教而遭处决，那么他定能大有作为。”

在1865年4月20日的信中，尼古拉神父写道：“那位祭司迫切地期待着我为他施洗。他学识渊博、聪慧过人、口才出众，并且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基督教。他现在一生的唯一目标就是通过传播基督教来为祖国服务，而我不得不不断阻止他的请求，生怕他在为这一目标做任何事情之前就丢了性命。”

萨瓦贝的以下叙述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处境的危险性：“我无法公开阅读这本书[《福音书》]，却又渴望阅读。于是，我便想出了一个办法，趁在自己的‘米亚’[即异教神庙]举行仪式时偷偷阅读。有时，我会把《福音书》放在面前，代替异教的礼拜书，一边敲着平常用的鼓，一边阅读。谁也没想到，我竟在读外国的‘异端’。”

不久，佐波将他的朋友——医生堺敦则——介绍给了尼古拉神父。过了一段时间，第三位朋友——医生浦野——也加入了他们。日本人开始自行进行教理讲授，到1868年春天，已有近20人准备接受洗礼。

此时，长崎再次爆发了针对天主教徒的迫害，而函馆则迎来了一位新任官员。1868年4月，尼古拉神父在其书房里秘密为三位朋友施洗，随后他们离开了函馆。他们分别是保罗·泽边、约翰·堺和雅各·乌拉诺。正是在那时，即明治时代开始前的五个月，日本东正教会便由此诞生了<sup>7</sup>。

佐贺部随即遭遇了严峻的考验。他的妻子精神失常，几个月后在病发时烧毁了自己的房子。佐贺部始终未能找到避难之所，不久便返回了函馆。此时，他不仅没有谋生手段，甚至连栖身之所都没有。就在同年（1868年），他被关进了监狱。圣尼古拉写道：“在我眼前，一个人在上帝的恩典中重获新

生的过程正在上演；而在我视线之外，另一个过程已经开始——那是对新生的保罗的考验与力量的锤炼。”他八岁的儿子根据世袭权利，成为了同一座偶像庙的祭司，这使他能够养活自己和生病的母亲。后来，帕维尔·萨瓦贝看到自己的儿子也成为了一名基督徒，这给了他莫大的安慰。这些考验反而坚定了帕维尔的虔诚，1875年，他被按立为神父。

“我们这里第二位皈依基督教的是**坂井约翰**先生。他是一位当地医生，也是已皈依基督教的佐贺部先生的挚友。佐贺部曾试图说服他的朋友也皈依基督教，但坂井先生辩才无碍，很难说服他；于是佐贺部先生便开始更频繁地邀请他来我家，我们两人共同劝说他。最终，坂井先生也受了洗，甚至被按立为神父，但不久后因病在神父的职位上离世。第三位基督徒是乌拉诺·雅各先生，他也曾是一名医生。随后，在函馆，由现任的奥诺·约翰神父为他施行了圣洗礼，此后又有其他人受洗。但上述这些人是我们早期基督徒中的主要代表。此后，接受圣洗礼的人数日益增多，在日本系统传播基督教信仰的可能性也逐渐显现。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为了获得官方授权，我暂时前往俄罗斯，并在那里获得了圣 synod 的许可和祝福后，又返回了日本。我刚一抵达，佐贺先生便前来拜访，并顺便向我提及了一件奇怪的事：在我离开日本期间，坂井先生的行为十分反常，他整日只顾着从自己的生意中榨取尽可能多的利润，而其他基督徒却恰恰相反，努力与弟兄们分享一切。听闻此事，我本想揭露坂井先生，但随着他本人到来，事情立刻水落石出。坂井先生来见我时，交出了他筹集的100 日元（约200卢布），并表示希望将这笔钱用于教会事务。这样，佐贺部先生对坂井先生看似奇怪的行为所感到的困惑便迎刃而解了。

另一桩表面上同样奇怪的事件发生在**托米·彼得先生**身上。当时，大家都注意到他突然不知去向。没人知道他躲到哪里去了。我问了他的妻子，但她也不知道，尽管她的脸上既没有悲伤，甚至也没有

表现出特别的担忧。这一切都十分谜样，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就在此事发生11天后，某天晚上约十一点，托米·彼得先生在坂井先生的陪同下来到我这里。我看到他瘦得难以置信，骨头在脸色完全变了的脸上凸出得很厉害；看着他，真让人心疼。当我问他这段时间去了哪里，为何如此消瘦时，他回答说，这段时间他一直不眠不食，只为祈祷异教兄弟们能早日领受那道真理之光——他自己不久前才蒙受此恩。听完这一切，我对这种感人至深的虔诚表现深感惊讶。但我还是不得不提醒他，今后此类行为必须按照教会的规定进行，否则可能会严重损害自己的健康。”

## 来自俄罗斯的援助

1869年底，尼古拉神父请假前往俄罗斯，向至圣主教会议申请批准在日本开设俄罗斯传教团。

尼古拉神父于1870年2月抵达俄罗斯。1870年4月6日，他的申请获得批准，亚历山大二世陛下正式批准了圣 synod 关于在日本设立俄罗斯传教团的决议，该传教团由传教团团长、三名传教神父和一名辅祭组成。计划开支的一半由国库承担，另一半则从宗教事务部印刷基金中列支。该传教团每年共获拨款6000卢布，并一次性拨付10000卢布。传教中心设在东京、京都、长崎和函馆。尼古拉神父被任命为传教团团长，并晋升为大修道院长。该传教团隶属于堪察加教区管辖。传教士的职责在由尼古拉神父提交并经圣会批准的《传教团指示》中有所阐述。

尼古拉大修道院长本人于1879年写道：“东正教在日本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一个仅存在了8年的东正教传教团，在此期间仅有两名传教士，且没有任何明确的物质支持，其信徒人数却已达到天主教及所有新教传教团总和的两倍。”

在启程前往日本之前，尼古拉大修道院长得以与年迈的父亲见了一面。

1871年3月，他返回了函馆。在他缺席期间，传扬福音的工作仍在继续。年底，尼古拉大修道院长在仙台为十一人施洗。

1872年，<sup>基辅神学院8的研究生</sup>阿纳托利（蒂哈伊）神父抵达函馆。尼古拉大修道院长如此评价他：“我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助手了！”他将函馆教堂托付给阿纳托利神父，并于1872年2月4日迁往东京。

### 《圣经》及其他必要书籍的翻译

圣徒的主要事业——早在函馆时期便已启动——是将《圣经》和礼拜书翻译成日语。早在1869年，圣尼古拉就写道：“从迄今为止所说的一切来看，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日本，至少在不久的将来，‘庄稼很多’。而我们这边却连一个行动者都没有，如果不算上我这完全是个人性质的活动的话……即使我继续沿着原来的方向开展工作，但仅凭一人的力量，在这里几乎如同大海中的一滴水。仅《新约》的翻译工作，如果要做到精准（难道还能有其他做法吗？），至少还需要两年全神贯注的辛勤劳动。随后还必须翻译《旧约》；此外，哪怕只有最微小的基督教教会，也绝对有必要用日语举行礼拜；至于其他书籍，如《圣经史》、《教会史》、《礼仪学》、《神学》呢？这些同样都是当务之急。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内容，都需要翻译成‘日语’——而这种语言究竟能否让外国人像用母语写作那样，哪怕只达到一半的流畅和速度，目前尚不可知。”很久以后，他写道，翻译工作“蕴含着传教事业的全部精髓。如今，无论在哪个国家，传教工作都绝不能仅限于口头布道。像圣方济各·沙勿略那样手摇铃铛穿梭于街头、以此召集听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在日本，鉴于民众热爱阅读且对印刷文字的尊重日益加深，首先需要为信徒和受洗者提供用其母语撰写的书籍，且必须文笔优美，并经过精

心、美观且廉价的出版。对我们而言，那些阐明与天主教及新教在信仰上的差异的书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11. 教堂的设计出自圣彼得堡建筑师米哈伊尔·阿列菲耶维奇·什楚鲁波夫之手。1923年地震中损毁的圣像屏，曾由同样来自圣彼得堡的圣像画家瓦西里·马卡罗维奇·波谢霍诺夫绘制。建造教堂的捐款来自全俄罗斯各地。仅莫斯科一地就捐赠了200,000卢布，占工程总成本的40%。

12. 俄罗斯王位继承人对日本的访问也是为了配合这一盛事，但在天津发生事件后，皇储便离开了日本。

在函馆，由于缺乏翻译，礼拜仪式以教会斯拉夫语进行，而用日语吟唱和诵读的仅限于“主啊，怜悯我们”、“圣哉上帝”、“信经”和“主祷文”。在翻译“主啊，怜悯我们”这一祷文时，曾出现过如何翻译“怜悯”一词的问题，因为该词常被理解为对罪犯的宽恕。尼古拉主教曾说：“我们与上帝之间并不存在这种关系。我们将采用‘аварема’一词。就像母亲‘怜悯’孩子那样，在原始古俄语的语义中，就是‘怜悯’的意思。”就在同一地点——函馆，圣尼古拉开始将圣经从中文翻译过来，但他很快意识到中文译本的不完善，于是转而从教会斯拉夫语翻译《新约》，因为他认为教会斯拉夫语比俄语更准确。每节经文都与《武加大译本》、《七十士译本》和英文译本进行核对。在难懂的段落中，圣徒参考了圣约翰·金口（约翰·克里索斯托莫）的注释。他每天工作4至5小时，最多只能翻译15节经文。在圣徒完成《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其初稿）的翻译工作后，这些经文也开始以日语形式被诵读。此外，在函馆还翻译了使徒保罗致加拉太人、以弗所人、腓立比人和歌罗西人的书信，以及《罗马书》的一半内容。与此同时，他还翻译了简明祷文集（译自中文）、洗礼仪式和异教徒归信仪式、圣德米特里·罗斯托夫斯基的《东正教信条》、为慕道者编写的教理问答、《旧约》概要、米哈伊尔主教的《福音注释》以及普拉顿大主教的《道德神学》。

13. 1923年广州大地震期间，教堂穹顶坍塌，大教堂内的所有装饰及圣像屏均在火灾中付之一炬。传教团藏书达3万卷的图书馆也被烧毁。甚至连因极度高温而熔化的钟也一并遗失。 1923年10月20日召开的紧急主教会议上，决定重建该教堂。1929年12月15日，重建后的教堂举行了祝圣仪式。 负责重建大教堂的日本建筑师冈田真一并未改变建筑的整体比例，但给穹顶增添了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弧度，这一设计借鉴了佛教寺院建筑的风格，象征着飞鸟翱翔或向高处飞升。

圣尼古拉移居东京后，首先翻译了《八日祷文》，随后翻译了《彩斋三圣咏》和《斋期三圣咏》，同时着手进行《福音书》的新译本工作。他将《旧约》中所有用于完成全年礼拜循环所需的篇章都翻译了出来。 他不信任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那些不够严谨的译本，因此甚至尽量不去阅读它们，生怕受其影响或不自觉地从其中借鉴任何内容。圣尼古拉毕生的夙愿是翻译整部《圣经》。1910年，他表示根据自己的估算，要完成这项工作还需要五年时间。

“不应让《福音书》和礼拜仪式的译文降格至民众的理解水平，相反，信徒们应当提升自己，以达到能够理解《福音书》和礼拜仪式文本的境界。 《福音书》中绝不容许使用粗俗的语言。如果我遇到两个完全相同的汉字或表达，且它们在日本人听来和看来同样高雅，那么我当然 会优先选用普遍流行的那个，但我绝不会向无知妥协，在翻译的准确性上绝不做丝毫让步， 即使这意味着我不得不使用在日本鲜为人知的汉字。 我自己也感觉到，有时我的译文会让日本人费一番脑筋才能理解。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正教本身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

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困难和风险，还与以下事实有关：许多汉字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佛教徒和神道教徒使用，这赋予了它们非常明确的语义色彩，使得在东正教语境中使用这些汉字变得不可能或充满风险<sup>14</sup> 。 在某些情况下，圣父会将某段经文或某个概念的译文分发至各教区，并请神职人员和教友就此发表意见。

三十年来，每天晚上六点整，主教的常任翻译帕维尔·中井都会走进主教的居室——他学识渊博、勤奋不息，并且全心全意地信奉东正教。他坐在主教身旁的一个矮凳上，开始根据主教的口述进行记录。工作通常持续四个小时，于晚上十点结束。

“我面前摆着斯拉夫语和希腊语的礼拜文，手边还备有有助于正确理解这些文本的参考书。我的助手手边则有中文和日文词典及语法书，此外，我们面前还放着一份从北京我们传教团借来的中文礼拜文。我一边对照斯拉夫语文本，一边用希腊语文本核对，一边口述翻译，力求字面准确地表达原意；同事则用中文汉字与日语假名交替书写记录下来。这一阶段翻译的难点在于，日语语法与我们的截然相反，即在日语中，主语必须置于句首；在主语与谓语之间，必须容纳翻译中的所有内容，无论有多少从句和引导句，它们都必须置于主要谓语之前；在每个从句和引导句中，各部分的排列顺序也应如此。

当一首诗歌或祷文口述完毕，且其各部分的句法关系确定后，便开始对写好的内容进行润色，此时我最关注的是确保译文丝毫不偏离原文的含义；而我的同事则同样用心，致力于确保语法和文体结构的准确与优美。这部分工作最为艰巨且费时费力。此时尤其需要中日两国的学术造诣，因为，首先，必须清楚地了解每个汉字的含义，以便从众多同义汉字中挑选出最常用且最易懂的那个；其次，需要商讨是保留汉字的中文发音，还是赋予其日语发音，因为汉字从中国传入日本时，带来了中国式的单音读法，这种读法至今仍保留在汉字中，其完整体系仅为博学之士所掌握，但随着层层简化并向下普及，已在很大程度上渗透到最底层的民众之中；与此同时，几乎每个汉字都有日语译名，并拥有自己的日语读音。究竟该遵循哪一种？表面看来，似乎应当坚持纯正的日语发音，但经常会发现，即便是对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汉字的日语读音也往往不如汉语读音容易理解。第三，还需考虑是否应省略汉字的

日语拼音注音，抑或因汉字的难度或歧义而添加注音，以及添加到何种程度。简而言之，必须决定翻译应采用何种语言规范。考虑到所译内容的重要性，最庄重的学术语言对我们来说最为合适——这种语言既不因汉字数量多也不因发音复杂而令人却步，也不需要任何转写；但这种语言对中等学识者来说会很不方便，而对学识浅薄者则完全难以理解。考虑到我们翻译的作品应当让所有人都能理解，而这正是其主要价值所在，大众语言、民间语言便吸引了我们；但那样的话，我们的译文就会变得过于粗俗，以至于所有非平民阶层的人都会立即对其不屑一顾。我们决定采用一种中庸的语言。我们努力遵循这一原则，尽管由于标准的不明确和界限的模糊，这留下了无休止争论的广阔空间——在此过程中，我竭尽全力捍卫最大的通俗易懂性，而我的同事则致力于避免粗俗表达并保持语言的优雅。当所有这些困难最终消除，译文定稿且全书翻译完成后，我们会再次通读全书，仔细对照原文，确保全书中对于相同的原文词语和表达，都使用了相同的译文汉字和读音。”

由神学院的前学生组成的整个翻译团队，不仅致力于俄语神学著作的翻译，还翻译俄语文学作品（起初翻译部仅由在俄罗斯接受过神学教育的人员组成，后来也有日本人加入其中）。其中包括神学院院长伊万·塞努马及其夫人安娜·卢基尼奇娜·塞努马、曾在俄罗斯生活10年的神学院哲学与神学教授小西正太郎（后改信新教），以及著名翻译家和学者登里正武。这位圣徒曾写道：“尽管去翻译、去阅读吧。一旦了解了俄罗斯文学，了解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家族、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可能不爱俄罗斯。”

## 战争

自1900年起，反俄情绪再度加剧，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人们对东正教会的态度。D. M. 波兹涅耶夫引用了《日本》报上的一段典型报道：“东正教会是一个邪恶之地，那里不断向日本倾泻诅咒，并祈祷日本战败。它一直都是为俄罗斯效力的间谍的核心机构。日本人憎恨俄罗斯大教堂的圆顶——它高耸于整座城市之上，仿佛在向皇宫本身投以蔑视；也憎恨教堂的钟声，每逢周日清晨，那刺耳的喧嚣便扰乱了居民安宁的睡眠。”

1902年日本与英国缔结同盟后，日本与俄罗斯战争已不可避免。在1903年的主教会议上，尼古拉主教被迫回答了一个让日本东正教徒极为不安的问题：他们是否应该参与对俄战争。他回答说，他们应当与全体国民一道，履行对祖国的职责。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必须地将俄罗斯视为敌人，但“与敌人作战并不意味着憎恨他们，而仅仅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

1904年2月5日，日本与俄罗斯断绝了外交关系。当时在传教团工作的两名神职人员返回了祖国。日本教会的神职人员和教友们向他们的主教提出请求，希望他能留在日本。尼古拉主教回答说，他已经在上帝面前做出了留在日本的决定，将继续住在主教座堂旁边的那间小公寓里。“我希望，宣战不会给本教会的活动带来任何变化。教理讲师们将继续宣讲救主的福音，学生们将继续在传教士学校就读，而我本人将全身心投入我们礼拜书的翻译工作……

今天我照例在大教堂主持礼拜，但从今往后，我将不再参加本教会的公开礼拜……迄今为止，我一直为大日本帝国的繁荣与和平祈祷。如今，既然日本与我的祖国之间已宣战，作为一名俄罗斯臣民，我无法为日本战胜我的祖国而祈祷。我对祖国也负有责任，正因如此，看到你们履行对祖国的职责，我将感到欣慰。”面对对俄宣战的消息，日本东正教会的所有教区都收到了《通告》，其中主教祝福日

本基督徒履行忠臣的职责，但同时也提醒道：“凡不得不奔赴战场、不惜牺牲生命者，请战斗——不是出于对敌人的仇恨，而是出于对同胞的爱……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神圣的情感……但除了尘世的祖国，我们还有天上的祖国……我们的这个祖国就是教会，我们都是教会的成员，在教会中，天父的儿女们确实组成了一家人……让我们共同履行我们对天国应尽的职责，各尽其责……同时，让我们热切地祈祷，愿主早日恢复被破坏的和平……”

圣父中断了与俄罗斯的一切书信往来，全身心投入翻译工作。

当俄罗斯战俘开始抵达日本（总数高达7.3万人）时，圣尼古拉在获得日本政府同意后，成立了“战俘精神慰藉协会”。为了照料战俘，协会选派了五位精通俄语的神父。每一位抵达日本的战俘，都受到日本教会的祝福，获赠一枚银质十字架。战俘们还获得了圣像和书籍。主教本人也多次通过书信向他们致意。

尼古拉主教在战争期间的活动不仅在日本，而且在俄罗斯都受到了极高的评价。1905年底，尼古拉二世皇帝在致尼古拉主教的信中写道：“……您向世人昭示：基督的东正教会，既不沾染世俗的统治，也不涉及任何种族仇恨，平等地包容所有民族和语言。 <...>您遵循基督的诫命，没有抛弃托付给您的羊群，而爱与信仰的恩典赋予了您力量，使您能够经受住战争的烈火 考验，并在战火纷飞之中，在您辛勤建立的教堂里维系着和平、信仰与祈祷。”

圣尼古拉在战争期间所展现出的非凡机智与智慧，在战争结束后进一步提升了他在日本社会中的声望。这位圣人的声望有助于迅速克服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并为俄日关系密切铺平了道路，这种密切关系一直持续到1917年。

战后时期带来了新的考验。来自俄罗斯对日本东正教传教团的捐款几乎完全中断。因此，传教团被迫解雇了30名教理讲师，并关闭了教理讲师学校。

1908年，塞尔吉（蒂霍米罗夫）主教抵达京都教区。他迅速掌握了日语，并积极开展传教活动，足迹遍布日本各地。他的到来让尼古拉大主教倍感欣慰，他在信中写道：“现在我可以安心离世了，因为确信传教事业已交托给可靠的人手中”，还写道：“.....我们还需要两位同样热忱的传教士。为此我们向上帝祈祷，并将目光投向俄罗斯。”

## 生命的最后几年与离世

1911年7月，尼古拉神父在日本传教五十周年纪念活动隆重举行。塞尔吉（蒂霍米罗夫）主教写道：“来自日本各地的神父、教理讲授员们纷纷赶来..... 仅他们就超过120人，许多地方的信徒也积极参与其中。于是，这位75岁的长老每天从清晨到深夜都坐在自己的房间里，聆听神父们关于各自堂区状况的汇报，听取教理讲授员们关于其管辖范围内布道工作的讲述，或者亲切地与从遥远地区赶来的某位老奶奶交谈。大公会议开始了.....会议上难道不忙得不可开交、波澜起伏吗？周年庆典..... 仅一天之内，就有圣体礼仪、祈祷会、在酒店与贵宾共进午餐，以及音乐晚会。我们这些年轻人到此便结束了行程。但这位75岁的长者受邀参加了苏鲁加达伊学校往届女生的聚会。于是他去了。在那里，他与其说是倾听，不如说是发言和教导。真让人惊叹，主教大人究竟是如何熬过这样一天的.....而第二天也丝毫没有休息的迹象。长达四个小时的贺词宣读。到了晚上，还在传教所的庭院里与数百名基督徒共进晚宴.....但我觉得，若非最后那一刻，这一天对已故的主教而言本该还算顺利..... 受演讲鼓舞，主教站起身来，以非同寻常的活力猛地扬起头，用足以传遍整个广场的声音——那里正聚集着数百名正在用餐

的基督徒——提议齐唱日本国歌，以向日本天皇陛下致敬，日本天皇——正因他的宗教宽容，基督教不仅得以传播，而且即使不能说是受到庇护，至少也享有完全的安宁。真该亲眼看看主教那不同寻常的激动神情，以及他那泛着红晕的脸庞。真该听听主教不仅率先唱起赞美诗，而且一直唱到最后……真该看看那已不再年轻的躯体中燃烧的这股青春之火。那时每个人都会明白，这一刻对于主教那颗伤感的心来说，绝不会无声无息地过去……”

这几天的精神紧张和过度劳累加剧了主教所患的心源性哮喘。他的体力开始迅速衰退。

临终前不久，主教对塞尔吉乌斯主教说：“……我们的角色不过是一把犁而已。看，农夫犁完地后，犁就磨损了。他便把它丢弃了。我也磨损了。人们也会把我丢弃。新的犁将开始耕作。所以，你们要看准了，去耕作吧！诚实地耕作！不知疲倦地耕作！愿上帝的事业日益兴盛！不过，能被上帝选中来耕耘，终究是件令人欣慰的事。这意味着——你也没有生锈。这意味着，在上帝的田地里劳作的过程中，你的灵魂也得到了一定的净化，为此，我们要永远感谢上帝。”

尼古拉大主教最后一次主持礼拜是在1912年圣诞节的第一天。几天后，他被送入筑地圣路加医院。然而，2月5日，主教为了尽快处理完手头事务，坚持要求被送回鹫神台，并重新投入翻译工作。2月13日，他向主教会议提交了关于传教区事务状况的最后一份报告。

2月15日，主教要求恢复原本在隔壁房间进行、但因医生建议而取消的唱诗班排练，并请求演唱他最喜爱的《在巴比伦河边》。

当晚，他开始神志恍惚，临终前数次念出“复活”一词。2月16日晚上七点四十五分，大教堂的钟声响起，宣告圣尼古拉大主教的逝世。

15. 大主教谢尔盖（蒂霍米罗夫）于1945年4月以“俄罗斯间谍”的罪名被捕。同年8月10日去世。

塞尔吉主教写道：“主教大人已不再呻吟。 护士也不再给他注射药物。唯有那轻声诵读的基督圣言——主教曾为侍奉这圣言奉献了他整个神圣的一生——打破了死亡的神秘氛围。就在不久前，甚至就在昨天，他还在病榻旁神采奕奕地交谈，并制定着未来十年的工作计划。<...>

这位至高尊贵的总主教的遗体安放在十字架教堂内.....2月4日（旧历）星期六的早晨和傍晚（通宵守夜礼后）、星期日的圣体礼后及傍晚、2月6日星期一的早晨和傍晚，这里都举行了庄严的追思礼，教堂内始终座无虚席。 主教的遗体尚未安放进棺木，因为棺木尚未准备好。这些天，我目睹了一项奇特的习俗，这是我在日本任职期间首次见到！一群知名的基督徒经相互商定，从傍晚起便来到逝者的遗体旁，通宵守灵直至次日清晨，聆听《福音书》的诵读。

主教的遗体用来自圣约阿萨法·别尔哥罗德基圣髑的圣油进行了擦拭。凭借A.P.西涅尔尼科娃捐赠的款项，在谷中墓地（上野区）购置了一小块土地，并于2月22日在此举行了安葬仪式。清晨，在四座祭坛上举行了四场为尼古拉大主教灵魂安息而举行的圣体礼。11点，在基督复活大教堂开始了葬礼仪式，主要按照日本传统仪式进行。 在众多花圈中，日本天皇献的花圈尤为引人注目——外国人能获得这一殊荣实属罕见。告别仪式结束后，灵柩被绕大教堂一周，随后安放在灵车上。绵延十公里的葬礼队伍朝着墓地进发。“狂风肆虐，撕扯着我们的旗帜。 只得将它们垂下高举。男学生、女学生们跟在后面。大家都穿着统一的制服。每个人手中都拿着棕榈枝，象征着对主教在日本事业必胜的信念。无数鲜花，数百个花圈。圣像、十字架。身着圣衣的神父、执事..... 许多教理讲师身着圣袍。主教身着全套礼服，手持牧杖。主教的勋章。主教生前佩戴的所有主教职衔标志。最后是载着珍贵棺柩的灵车，以及身着绣金宫廷制服的俄罗斯代表。还有那条绵延不绝的基督徒长队.....”

## 圣尼古拉大教堂

要实现建造大教堂的计划，既需要巨额资金，也需要社会支持。为了筹集资金，尼古拉大修道院长前往俄罗斯。1879年至1880年间，他先后访问了圣彼得堡、莫斯科、喀山、基辅和敖德萨，募集自愿捐款。

在俄罗斯，国民教育部长、后来成为国务委员会成员的叶菲米·瓦西里耶维奇·普蒂亚廷伯爵，始终为这一使命提供了大力支持。1853年，普蒂亚廷海军中将乘坐旗舰“帕拉达”号护卫舰，为俄罗斯海军“开辟了通往日本的道路”；他不仅建立了两国的外交关系，还签署了日本与俄罗斯之间的第一份正式友好条约。作为圣彼得堡社交界和政界有影响力的人物，普蒂亚廷视尼古拉如亲生儿子，并满怀爱心地关照传教团的各项需求。海军上将的女儿奥尔加也与尼古拉神父关系亲密，1884年，她以修女身份来到日本，协助他开展传教活动。

鉴于传教团在日本取得的成就，圣 synod 决定向该地派遣一位主教。除了尼古拉本人之外，实在难以再推举其他候选人。1880年3月30日，他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接受了主教祝圣。尼古拉主教乘坐“自愿号”军舰返回他的第二故乡途中，顺道造访了巴勒斯坦，朝拜了主的圣棺，并带回了一枝棕榈枝。

最初，未来教堂的草图由圣彼得堡建筑师、A·舒鲁波夫教授设计。建筑平面呈希腊十字形，穹顶则采用拜占庭风格。尼古拉在神田地区的骏河台山顶购置了一块地皮，中世纪时期，那里曾矗立着一座消防瞭望塔，同时也作为驶入江户港（旧东京）船只的灯塔。工程由英国建筑师约书亚·康德负责，他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曾在东京建造了50多座建筑，其中包括皇宫。7年后的1891年，康德将基督复活大教堂的钥匙交给了尼古拉主教。19位日本神父和4000多名基督徒出席了祝圣仪式。这座被民众

称为“尼古拉堂”（字面意思是“尼古拉教堂”）的东正教教堂，很快便成为了日本首都的一处地标。俄罗斯水手们从其轮廓中认出了俄罗斯海军主教堂——克朗施塔特圣尼古拉海军大教堂的影子。在1923年那场重创东京的强烈地震发生之前——该地震后，多层建筑开始兴建——这座位置优越的东正教主教堂曾是该市最高的建筑之一。这招致了诸多指责：“大教堂高耸于皇宫之上，实属不敬”，“这是俄罗斯方面专横跋扈的表现。”

不过，大教堂的建筑规模及其在日本首都所占据的地位，恰恰与尼古拉本人的人格气度以及他当时在日本社会所扮演的角色相称。这位主教备受尊敬，无论在俄罗斯还是日本，都有众多仰慕者。人们在极其广泛的问题上都寻求他的权威意见，从东方学文章到国家间关系皆然。尼古拉主教的外交才能在解决著名的“天津事件”冲突时尤为凸显，当时俄罗斯王位继承人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遭遇了刺杀未遂。

这是一起史无前例的事件。应日本天皇邀请访日并获得后者安全保障的俄罗斯皇储，竟遭到其随行警卫中的一名警察袭击。日本因此面临一场轰动性的外交失败，甚至面临国家安全的威胁，因为当时护送皇储的七艘俄罗斯军舰，要摧毁整个日本舰队简直易如反掌。俄方拒绝接受天皇派来的日本医生治疗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了他们的愤怒，尽管伤势微不足道。天皇本人急忙亲自前往探望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将其送至港口，甚至登上了俄罗斯军舰——这对在位的日本君主而言是不可想象的举动。俄罗斯公使谢维奇和尼古拉主教介入了此事。尼古拉主教尤为热心，特别是比其他人更竭力劝说这位同名的皇储，不要将此事发展成与日本的战争。皇储接受了日本天皇的道歉。这一事件得以和平解决。

1910年，尼古拉在日本任职50周年纪念活动隆重举行。圣 synod 将其晋升为大主教。日本天皇、东京都知事、日本媒体以及外国使团都向尼古拉表示了祝贺。东京总督在致辞中说道：“.....我认为，德高望重的尼古拉神父（ ）为我国所作的贡献，不仅限于一位传教士的成就，更体现在他促进了我国的文明发展.....”

在日的其他外国人也对俄罗斯传教团给予了热情的评价。据一份英文报告记载：“与日本圣公会并驾齐驱的，是那由日本最杰出的基督徒——尼古拉大主教领导的卓越的俄罗斯传教团.....”

主教本人这样谈论自己的功绩：“农夫用来耕地的犁，难道有什么功劳吗？它难道能自夸说：‘瞧瞧吧，东正教徒们，我干了多少事！.....’我们的角色并不比犁更高。农夫耕完地后，犁就磨损了。他便把它扔掉了。我也一样，终将磨损。终有一天，我也会被丢弃。新的犁将开始耕作。所以，看啊，去耕作吧！诚实地耕作！不懈地耕作！让上帝的事业日益兴盛！

不过，能被上帝选中来耕耘，终究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这意味着你并没有生锈。这意味着，在上帝的田地里劳作，你的灵魂也多少得到了净化。为此，我们要永远感谢上帝。”

## 尼古拉·雅波斯基的箴言与教诲

### 为试炼预备你的灵魂

*圣尼古拉·日本教父于1887年7月在日本教会大公会议上的讲道*

《圣经》中说：“我儿啊！如果你要侍奉主上帝，就当预备你的灵魂面对试炼：管好你的心，要坚定不移，在受试炼时不要惊慌；紧靠祂，不要退缩，这样你最终必得尊荣。无论遭遇何事，都要欣然接受；在受屈辱的变故中，要长久忍耐”（《德训篇》2:1-3）。我们在此的每个人，当然都已开始为上帝劳作，因此深知侍奉上帝意味着要勉力劳作。但我们也知道，在这侍奉之中也蕴含着巨大的喜乐。因为全知全能的上帝不仅看见为祂劳作的人，还会帮助他们；仁慈的上帝也深爱着他们。然而，事奉上帝的道路充满了危险与绊脚石、软弱与跌倒，因此圣经教导我们：若想事奉主上帝，就当预备好自己的心灵，以面对各种试探。

试探有两种：第一种是从上头来的试炼；第二种是从下头来的诱惑。关于从上头来的试探，圣经这样告诉我们：“金银在火中被炼净，神也这样试炼人的心”（箴言17:3）。黄金有纯的、有掺杂杂质的，也有伪造的。经火炼时，纯金不会受到任何损害，反而变得更加璀璨；掺杂杂质的黄金会被提炼出纯净的部分；而伪造的黄金最终会变成毫无价值之物。同样，人的美德可能真实，也可能掺杂着自负、骄傲或其他情欲，甚至可能完全是虚假的、不真实的，正如那些伪善的法利赛人一样。因此，从上头来的试探决定了人美德的品质。上帝从一开始就洞悉人的内心，因此祂降下试探，并非为了了解我们的美德如何，而是为了人本身——若人能在试探中察觉到虚假与伪装的掺杂，便会悔改并转向善。愿我们也不要失去这些从上头而来的试探。

但除此之外，还存在另一种试探，即来自魔鬼的诱惑。魔鬼将黑暗注入人的思想，向人心灌输各种污秽，使人陷入混乱，从而引诱人行恶，其目的是要使侍奉上帝之人的灵魂背离上帝。

我们这些投身于事奉上帝的人，必须时刻铭记，自己正身处这些试探与诱惑之中。圣经上说：“你们要清醒，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

5:8-9)。所有教理讲授者和神父都处于魔鬼的严密监视之下，魔鬼为了战胜他们，会射出无数火热的箭。其中最具破坏性的一支箭，便是自满与骄傲。因为许多教理讲授者还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投身于讲道，而人们却已经称他们为老师和导师。魔鬼利用这一点，轻而易举地将骄傲植入他们心中，这并不令人惊讶；已有多少教会事工人员被这支箭击倒了！每年我都会培养出许多教理讲授员，但其中不少人却跌倒了。原因何在？这一切都源于自满与骄傲。如果有些基督徒试图劝诫他们，他们反而会因此动怒。魔鬼还有许多其他的火箭，他用这些箭击倒那些无法抗拒他的人。凡是被从教理讲授者名单中除名的人，无一例外都是如此。弟兄们，有多少人原本开始为上帝工作，却未能经受住试探而跌倒了。这真是令人痛心！

因此，我们时刻为抵御诱惑做好准备至关重要，因为这正是我们力量的根基。倘若我们不做好准备，便会不断被诱惑所战胜。魔鬼将用他的箭矢击中并杀害这样的人。此刻，在主教会议开始之际，我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决定将这一切作为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告诉你们。

关于我们应当采取何种方法来为抵御诱惑做好准备，《圣经》已向我们作了明确的阐述。

首先，“要预备你的心”（《德训篇》2:2），也就是说，要守护你的心，改正你的行为，培养美德，这样就能避免陷入诱惑。正如一艘船，若能妥善看管并妥善驾驭，既不怕风暴，也不惧汹涌的波涛；但若看管不善，则有遭遇海难的危险；又如一匹马，若不加以妥善驾驭，便可能狂奔，最终翻倒或跌入深坑；人的心亦是如此：若不加以妥善管理，又会发生什么呢？无非是魔鬼会靠近我们，将各种邪恶的念头植入我们的思想，从而扰乱我们的内心和行为。

其次，“要恒久忍耐。”人天生容易倾向于作恶，因此，为了战胜诱惑，必须甘愿忍受各种劳苦和悲伤，克制自己，并将自己的心引向真理。若不经历劳苦与悲伤，我们就无法克服任何困难，因为若无劳苦与悲伤，谁又能战胜仇敌呢？

第三，“紧靠上帝，不要背离祂”（《便西拉智训》2:3）。紧靠上帝，我们便能在任何诱惑中安然无恙，正如一艘抵达港湾的船，已不再惧怕风暴。

弟兄们，在主教会议开始之前，我想对你们说这些话，并希望你们将这些话铭记于心，并加以珍藏。

### 致马卡里（涅夫斯基）大主教的信<sup>1</sup>

我于12月30日收到了您去年11月4日寄来的珍贵来信。感谢您带来的消息，尽管这些消息令人悲伤。对外战争中接连遭受的挫败，国内持续不断的动荡与流血——看来，上帝已经离弃了俄罗斯，或者更确切地说，上帝之手正不遗余力地惩罚我们这可怜的祖国！但当然，我们坚信，这是慈爱之父那惩罚的右手，正在纠正祂那个深陷不法之中的孩子。在这黑暗的日子里，当乌云依然笼罩着俄罗斯，似乎预示着将有无数的闪电和雷鸣时，这份信仰是我们唯一的慰藉。“现在我们可以羡慕你们了，”您写道。是的，这里没有革命，很平静；但内心的不安恐怕比你们那里还要多：正因为无处倾诉、无人可谈，这些思绪才更加令人痛苦。

---

<sup>1</sup> 圣马卡里（涅夫斯基），莫斯科和科洛缅斯克大主教（1835–1926）。曾任莫斯科和科洛缅斯克大主教（1912–1917），阿尔泰大主教（自1920年起），杰出的传教士，阿尔泰各民族的启蒙者。

感谢上帝，这里的教会一切安好。布道比战争期间要活跃得多，因为曾为战俘服务的牧师们已经回到了各自的会众中。此外，随着战争硝烟的消散，那些针对源自俄罗斯的东正教的偏见——例如所谓“东正教只是为了征服日本”之类的说法——也随之烟消云散。几位年轻的教理讲授员曾被征召参战；归来后，他们立即请求重返教会服务，并热忱地继续着这项工作。各地都有听道的人，神父们也经常报告举行洗礼的消息。我们今年的大公会议将格外盛大，愿上帝保佑，它定能重振教会。总之，这里的一切都令人振奋。只是我没有助手。我已年迈——一只脚已踏入坟墓——年届七十，却孤身一人，将来无人能接管教会；这便是我常有的忧伤。不过，有一点的慰藉：教会的事业并非我们私人的事业，而是大家的；我们只是仆人；主若愿如何安排，就随祂的旨意吧！

恳请您赐予大牧首的祝福及圣洁的祈祷，以护佑此地及当地的教会传教工作；我怀着真诚的虔诚之心，并因您对当地传教团及教会的善意[善举？]，谨此向您表达由衷的敬意，并荣幸地成为您至尊主教阁下最谦卑的侍从与虔诚的祈祷者——驻日本俄罗斯传教团团长

*尼古拉，雷韦尔主教  
东京，1906年4月14日*

\*\*\* \*\*

至高尊贵的主教大人，仁慈的大牧者与父亲！

我早已收到您珍贵的来信以及您慷慨赠送的两本书。对此，我向您致以最深切的谢意。这两本书我已阅读完毕，并已装订妥当，纳入传教团图书馆的目录，以永远铭记捐赠者，并惠及读者。关于您的来信，我首先要衷心感谢您那兄弟般的问候，祝愿我长期服事并蒙授大主教圣职——这完全是我不配的。我期待由安德罗尼卡[尼科尔斯基]大修道院长<sup>2</sup> 接任我的职位，他此前曾在此地服事，但因患神经衰弱而离任。如今他是乌法神学院的院长，看来已完全从疾病中康复。圣公会似乎将派他以副主教的身份来到这里，对此我将深感欣慰，因为安德罗尼克大修道院长充分具备一位优秀传教士所必需的品格。我一直很高兴您喜爱日本人，并对他们给予如此善意的评价；而您那句“我愿意去日本担任传教士！”的善意之言，更是让我倍感鼓舞和受宠若惊……仅凭这句话，我就不再认为自己的一生完全是徒劳的。

您信件的后半部分却令人沮丧，尤其是自那以后，不仅没有出现转机，我们这贫瘠的祖国上空的阴霾反而愈发浓重。每当读到报纸上关于谋杀、抢劫、罢工、学生群体的懒散、神学院学生的野蛮行径等等、等等的报道时，报纸总会从我手中滑落。大公会议恐怕要推迟到局势普遍趋于平静之后；否则，即便是最善意的决议也会被曲解，所采取的改进措施也会被过度吹捧或歪曲。

在这里，就传教工作和教会而言，感谢上帝，一切安好，一切照常进行。我主要忙于礼拜仪式的翻译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八音集》的第四声调；正在将斯拉夫文文本中的全部内容完整地翻译出来。正是在这里，你才能真切地体会到将礼拜仪式翻译成俄语是多么必要，或者至少——将斯拉夫文文本改写成通俗易懂的形式是多么必要。有时光是理解一节经文的含义，就要花上半个小时甚至更久；

---

<sup>2</sup> 安德罗尼克（尼科尔斯基）（1870–1918），彼尔姆和昆古尔大主教，殉道圣徒。

有时则无论怎么琢磨，都完全无法理解，只好用当时上帝赐予的灵感来填补那些难以理解之处。主教会议的当务之急之一，应当是成立一个负责修订礼拜文本的委员会，但绝不能是那种会将此事拖延上百年的冗长委员会。

不愿在书籍方面欠您人情，作为对您所赠两本书的回礼，我特此从这里向您的大主教阁下回赠两本：一本是为当地教会提供教诲而出版的、关于我们大公会议的图文并茂的描述，另一本是日语版的《诗篇》。请原谅，我们虽无甚可赠，但仍乐意奉上。

恳请您赐予牧首的祝福，并为本人及当地整个教会献上圣洁的祈祷。我怀着由衷的敬意、最真诚的赤诚奉献以及兄弟般的爱，荣幸地成为您至圣尊下的最谦卑的门徒和虔诚的信徒——驻日本俄罗斯传教团团长

*尼古拉，雷韦尔主教  
东京，1906年9月18日*

## 结语

将东正教之光带入日本的主要功绩，归功于一位杰出的俄罗斯传教士——日本使徒尼古拉大主教，这位“日本使徒”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在“旭日之国”从事传教事工。日本圣尼古拉不惜耗费心力与时间，深入研究当地语言和人民的生活，随后在这片土地上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不懈活动，其成果令人瞩目：他从一位孤身奋战的传教士，成长为拥有数十名日本牧师和数万信徒的教会领袖。如今，日本自治教会存在于后工业化日本的复杂环境中，这里既有多元教派的传统，知识分子中盛行以科学为中心的思潮，还有新宗教派别和社团的咄咄逼人。

在该国基督教传教史上，没有人比圣使徒等同的大主教尼古拉更配得上这一称号。

圣使徒等同的尼古拉神父，请为我们在上帝面前代祷！



---

《传教简报》A33  
编辑：亚历山大（米莱安特）主教